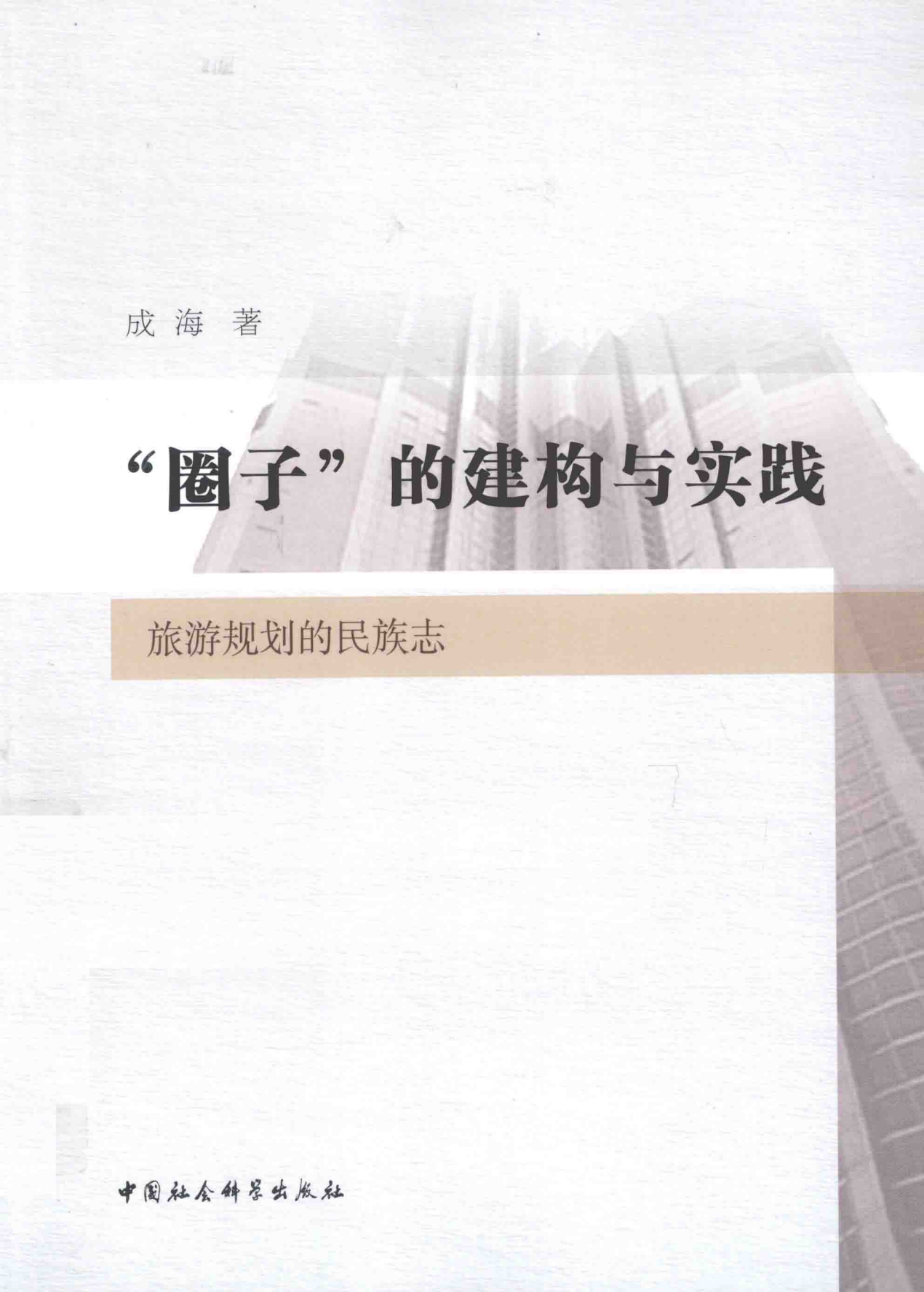




成 海 著

“圈子”的建构与实践

旅游规划的民族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成海 著

“圈子”的建构与实践

旅游规划的民族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圈子”的建构与实践:旅游规划的民族志 / 成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358 - 1

I. ①圈… II. ①成… III. ①旅游规划 - 研究 - 中国 IV. ①F5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593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颖

特约编辑 李继堂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何 颖



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06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著作由西南林业大学专著出版基金、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云南生态旅游本土化与创新研究）共同资助出版

摘 要

中国目前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还远未成为研究主流，其原因之一就是对于旅游研究的民族志缺失。本书选取了国内外还没有学者涉足的研究领域：以民族志的视角研究旅游规划圈子，以期对旅游规划圈子进行基于民族志观察的民族志理解，为建构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性提供一份素材。同时，本书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手段展示和分析旅游规划的圈子文化，以人类学的反思精神呼吁旅游规划圈子的自觉和反思意识，避免旅游规划圈子自娱自乐的“内卷化”倾向。

作为国内第一份具有探索和实验性质的旅游规划民族志，作者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回顾了旅游规划在中国的兴起以及旅游规划圈子的形成（第一章）；分析了旅游规划编制主体作为旅游专家系统的构建（第二章）；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旅游规划的过程（第三章）；讨论了旅游规划圈子的核心竞争力——创新的产生（第四章）；接着分析了旅游规划编制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第五章）；还有旅游规划文本风格及其权威（第六章）；文章还探讨了旅游规划涉及的权力、话语和公平问题（第七章）；最后是笔者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和个人理解，对旅游规划圈子的反思性总结（第八章）。笔者试图说明：旅游规划圈子的建构与实践，实际上就是旅游规划专家系统的建立及运作的过程，是一种现代性的后果。

本书提出了以下独立见解：

第一，旅游规划者凝视是旅游凝视理论的一方面，其所蕴含的“权力”和“权威”，本质上就是吉登斯所谓的“脱域的”（disembedded）专家系统所代表的专业知识的权力和权威，是“现代性的后果”。旅游规划的过程就是脱域的专家系统“重新植入”（reembed-

ding) 旅游目的地过程, 换句话说, 是专业技术知识“域化”的过程。旅游规划者凝视不仅仅代表自己的目光, 更要代表甲方、游客和政府等各相关利益主体的目光, 是多种力量作用下的“合力凝视”。

第二, 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多成分、多变量、具有耗散结构的开放系统, 也必然存在着熵增现象。作为一种智力劳动过程, 旅游规划是一项复杂的信息组织、运用及创新活动, 表现为人们试图通过知识(信息)来指导旅游地的旅游业发展, 最大限度地抵消旅游目的地社会生态系统的熵增, 对旅游地的旅游业来说意味着输入一种负熵, 以消除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本质上是为旅游地寻找、开发、创造负熵的过程。

第三, 旅游规划表面上只是甲乙双方之间的一种市场行为, 但由于旅游规划的对象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旅游目的地, 终极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公众(包括东道主和游客), 因此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为社会公众提供旅游服务并使相关利益主体公平受益的实践活动, 具有典型的公共服务性和社会共享性, 是一种社会公器, 承担着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和任务。

第四, 旅游规划编制者及其实施者应超越旅游产业经济属性的传统思维模式, 以一种价值至上与社会良心的姿态,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体现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 超越现代性, 使旅游活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幸福的强劲动力。

关键词: 旅游规划; 圈子; 民族志; 现代性; 脱域

目 录

绪论	(1)
一 写作背景及动机	(1)
二 相关研究综述	(5)
三 关键理论及概念界定	(17)
四 研究方法及写作框架	(26)
第一章 规划中国旅游的盛宴	(29)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浪潮	(29)
一 大众旅游——现代性的后果	(29)
二 后现代旅游的兴起	(32)
三 全球化视野下的旅游开发	(35)
第二节 中国旅游规划市场的形成	(38)
一 从旅游事业到旅游产业	(38)
二 旅游规划市场的内驱力	(39)
三 旅游规划的产业化	(41)
第三节 旅游规划专家系统及其运作	(44)
一 因项目而走到一起的人们	(44)
二 作为专家系统的乙方分化	(45)
三 圈子的运作	(50)
第二章 旅游规划编制的主体	(54)
第一节 关于规划资质问题	(54)
一 旅游规划单位的资质	(54)
二 成为规划主持人	(58)
三 规划人员的选拔	(60)
第二节 融入与接纳	(62)
一 圈子中的新成员	(62)

二	规划技能的习得	(64)
三	个体和圈子间的认同	(65)
第三节	从依赖走向独立	(68)
一	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68)
二	学会合作与妥协	(70)
三	人脉建构与个体独立	(73)
第三章	旅游凝视的建构	(76)
第一节	规则的制定	(76)
一	旅游规划的法律问题	(76)
二	旅游规划的国家标准	(78)
三	旅游规划的评审	(83)
第二节	旅游规划项目的运作	(88)
一	甲方的招标及委标	(88)
二	乙方的竞标及承标	(90)
三	规划协议的签订与执行	(92)
四	甲方和乙方的合作博弈	(95)
五	圣俗之间	(96)
第三节	规划游客凝视	(99)
一	为眼球经济服务	(99)
二	符号化旅游与旅游的符号化	(102)
三	传统的遗忘与发明	(105)
四	花街节的两种开发利用方式	(110)
第四章	旅游规划的创新	(114)
第一节	旅游规划的后果	(114)
一	旅游规划的水平 and 档次	(114)
二	被否定的旅游规划	(117)
三	作为标杆的旅游规划	(119)
第二节	旅游规划创新	(120)
一	理论创新和项目创意	(120)
二	旅游规划的图件创新	(123)

三 关于创新的分歧	(124)
第三节 旅游规划团队与创新	(126)
一 旅游规划创新的动力机制	(126)
二 个体创新与合作创新	(128)
三 创新作为一种资本	(130)
第五章 圈子的竞争与合作	(132)
第一节 圈子的分化	(132)
一 旅游规划的市场细分	(132)
二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争	(134)
三 圈子的分化与发展	(135)
第二节 本地圈子和外地圈子	(137)
一 势力范围的划分	(137)
二 国外专家的介入	(138)
三 专家系统的脱域性	(141)
第三节 合作与出路	(143)
一 大圈子和小圈子	(143)
二 适可而止的竞争	(145)
三 合作与圈子的“内卷化”	(146)
第六章 旅游规划的文本	(149)
第一节 旅游规划文本风格的变迁	(149)
一 从“文”本到“图”本	(149)
二 给谁看的文本	(150)
三 读图时代的文本风格反思	(152)
第二节 旅游规划的语言与话语	(154)
一 不仅仅是修辞问题	(154)
二 文本和说明书	(155)
三 规划文本的个性化	(157)
第三节 文本权威和政治生态	(158)
一 文本权威的建构	(158)
二 基于政治生态的文本命运	(160)

三 被修编的旅游规划文本	(161)
第七章 权力、话语和公平	(163)
第一节 从大众旅游到生态旅游	(163)
一 传统大众旅游的利益主体观	(163)
二 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	(165)
三 可持续发展观与霸权	(165)
第二节 为谁规划的问题	(168)
一 甲方导向	(168)
二 游客导向	(169)
三 社区导向	(171)
第三节 权力失衡下的隐忧	(173)
一 被胁迫的旅游规划	(173)
二 旅游规划失灵	(175)
三 旅游“废都”的背后	(178)
第八章 旅游规划的人类学反思	(182)
第一节 旅游规划的本质	(182)
一 旅游规划的物理本质	(182)
二 旅游规划的经济属性	(185)
三 旅游规划是一种社会公器	(186)
第二节 旅游规划的理论体系	(188)
一 旅游规划的学科地位	(188)
二 旅游规划的方法体系	(190)
三 旅游规划学科的未来	(192)
第三节 旅游规划的价值取向	(193)
一 旅游规划的弱功利性	(193)
二 旅游规划的发展趋势	(195)
三 超越现代性的旅游规划观	(197)
结语	(201)
主要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15)

绪 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0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下发以来,全国很多省市加快了旅游业发展的步伐,旅游业逐渐成为很多省市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最快的经济产业”,受到了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并且相继有很多省市已明确地将旅游业作为其经济的主导产业,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①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旅游业发展的“第一道工序”,旅游规划由于巨大的市场需求而逐渐发展了起来。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写道:“一个社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是可悲的。”^②“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③当旅游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事实的洪流时,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社会的民族志研究没有理由对此熟视无睹。

一 写作背景及动机

(一) 写作背景

大学毕业6年之后的2002年,笔者放弃了本科所学的机械专业,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旅游管理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从2003年开始接触旅游规划,逐渐走入了旅游规划圈子并成为其中的一员,

① 刘晓明:《对旅游规划热的冷思考》,《特区经济》2005年第6期。

②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铨、王宏周、魏章玲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③ 高丙中:《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总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开始了自己的旅游规划生涯,截至2014年7月共参与20余个旅游规划项目,其中任副主持的有5个。硕士研究生期间,学院开设的《旅游人类学》课程使笔者学会了用人类学的视角看待分析问题,并因此奠定了对人类学的兴趣。2007年,笔者有幸考入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攻读旅游人类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基于笔者的学科背景及科研经历,在导师杨慧教授的指导和建议下,选取了国内外还没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以民族志的视角研究旅游规划圈子,以期对旅游规划圈子进行基于民族志观察的民族志理解。

“现代国家需要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①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因此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②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的调查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学术利器,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有效对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文体。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旅游人类学研究还远未成为研究主流,其原因之一就是旅游社会事象的民族志缺失。正如高丙中所言:“学术群体没有一个基本队伍担当起民族志事业,不能提供所关注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太不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③

综观目前国内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圈子,学者们大多是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人类学学者,他们的日常工作基本都属于纵向科研课题,几乎不接触旅游规划过程。旅游规划圈子则不同,其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成员也主要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规划公

① 高丙中:《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总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② 同上。

③ 同上。

司、设计院、国际组织等具有规划资质的单位。两者隶属于不同的结构体系,工作性质和目的都不一样,圈子人员很少交叉,大多数做人类学研究的不做旅游规划,做旅游规划的也几乎不做人类学研究,因此没有一个基本的学术团队对中国的旅游社会事象进行民族志研究,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缺乏基本的“素材”。笔者作为“局外人中的局内人”,^①不仅具有长达十余年的旅游规划实践和人类学田野工作基础,同时,笔者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得到了系统的人类学理论熏陶,有可能避免在研究过程中“主体的对象化”所带来的主体性迷失,避免研究者自我的“植入其中”或“沦为研究对象”,^②为比较客观地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写作动机

1. 探索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

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开创了旅游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新气象。但是,由于传统人类学关注弱势“他者”的学科兴趣倾向,旅游人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钟情于研究东道主社会的文化变迁问题。时至今日,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和学科视野仍然相当局限,主要局限于利用人类学传统理论对旅游活动和旅游现象进行分析,特别是限于对东道主及游客社会的分析上,总体上注重旅游带来的不良文化变迁问题。

① 自从人类学学科诞生以来,主流的研究取向是“我者”对“他者”“异文化”的观察和研究(客位视角),并在“他者迷,我者清”的潜意识支配下,将这种观察和研究自我标榜为“客观”和“科学”。事实上,对于“他者”而言,这种全新的解读虽然像镜子一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他者”不能自觉的文化图景,促进“他者”的文化自觉,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他者”而言,“我者”毕竟是“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局内人”,更多的可能是对“局内人”文化的歪曲和误解——无论是作为殖民主义一部分的人类学,还是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对文本话语的关注,都说明了传统人类学主流研究取向的这一“重大缺陷”。笔者认为,理想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应该包括“局外人”对“局内人”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局内人”对“局内人”的研究。但从人类学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来看,前者较多,后者凤毛麟角。为此,笔者试图以“局内人”的身份,用相对“局外”的视角和方法对“旅游规划圈子”这一“我者”进行人类学观察和反思,为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份“素材”。

② 彭兆荣:《民族志“书写”:徘徊于科学与诗学间的叙事》,《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

实际上,人类学的经典并不在于理论的说明,而在于那些长期流传的民族志典范,在于那些绚丽的画面和深层的描述,在于那些生动的东西背后展现的多样文化。^①民族志研究依据社会整体观所支持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社会事实,对整个社会科学、对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②

笔者以民族志的视角研究旅游规划圈子的形成及其文化,试图为旅游研究团体和社会公众提供一份旅游规划事象的民族志,呈现和建构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关于中国旅游规划的社会事实,为当今中国的旅游人类学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议题”,开创新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领域,拓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学术视野。

2. 对旅游规划进行人类学反思

我国的旅游规划编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缓慢,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旅游规划编制高潮。总体上看,旅游规划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超越,是市场经济的理性化、逐利化的要求,也是市场之中有计划的具体体现,规划就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水平的高低和编制执行情况是区域经济水平甚至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③。通过民族志方法来反思旅游规划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后所依赖的假设、价值、认同和话语,为当前蓬勃发展的旅游规划热注入理性的冷思考,避免旅游规划走向“污名化”的危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为一份具有探索和实验性质的旅游规划民族志,无论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文本,笔者都希望这样的探索能产生双重的意义和效果:对于规划圈子外的社会公众而言,它能使陌生的旅游规划圈子及其文化变得熟悉,变成一种社会公众可以理解的社会事实,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为建构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性提供一份

① 刘珥珥:《〈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译者前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高丙中:《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总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③ 陈晓亮:《关于旅游规划中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甘肃农业》2006年第12期。

素材；对于规划圈子内部的成员来说，则承担着使熟悉的陌生化、他者化，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反思旅游规划的圈子文化，避免旅游规划圈子在自娱自乐中走向“内卷化”^①。

笔者相信，“我们的研究必须是经验性、解释性、批评性和知识性的综合，从而必须在注重事实的同时，不以肤浅的观察作为事实根据来反对学术解释和学术批评”。^②正因为如此，笔者并不奢望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民族志叙述完全“客观”地再现旅游规划圈子的所有“事实”，本质上它不过是笔者对旅游规划圈子及其文化基于民族志观察的民族志理解，而且这种观察和理解是具体的、历史的“经验事实”^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再现性的文本，如果套用斯蒂芬·泰勒的话说，笔者希望它是一个“唤起”^④的文本——唤起社会对自身的反思，特别是唤起旅游从业者的反思，以期能促进旅游业及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超越。

二 相关研究综述

笔者试图用民族志的方式对云南旅游规划圈子进行解读，离不开诸多学者对旅游人类学、旅游规划及民族志研究的早期成果支持，对这三个研究领域进行简要的回顾及评述，不仅是本书行文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是笔者建构学术“共同话语”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①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根据格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此后，这一概念便被广泛应用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他学术研究中，意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增长，长期以来，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

② 纳日碧力戈：《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③ 李立：《小说化：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性》，《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④ [美] 斯蒂芬·A. 泰勒：《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李荣荣译，载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64页。

（一）旅游人类学研究

旅游人类学的产生源于人类学家对于旅游研究的关注，其本质是用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旅游事象。从源头上看，人类学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而人类学介入旅游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而正式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则是以1977年瓦伦·史密斯（Valene L. Smith）的《东道主与游客》（*Hosts and Guests*）一书为标志。^①20世纪70年代，随着旅游活动在西方社会的进一步普及，人类学学者对旅游的研究也越来越成熟，旅游人类学凸显为西方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了格雷本（Nelson Graburn）、史密斯（Valene L. Smith）、马康纳（MacCannell）、纳什（Dennison Nash）和科恩（Erik Cohen）等为代表的研究群体。^②

学者们把人类学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用于旅游研究，逐渐形成了三种视角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即东道主、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的研究视角，主要研究兴趣和焦点集中在旅游客体（东道主及东道主社会）和主体（游客及客源地社会）。其中，关注东道主社会的人类学者认为旅游引发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因而把旅游看作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从游客出发，学者们认为旅游活动的结构、功能与人生经历仪式（Rites of Passage）相似，因而旅游可以看作一种世俗仪式；为了弄清楚旅游的成因，学者到客源地社会寻找答案，认为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依赖于其他更为根本的社会因素的。

在熙熙攘攘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大潮中，基本形成了两大研究流派：一是对旅游行为所内含的符号意义的解读，二是对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和丹尼逊·纳什（Dennison Nash）是这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前者热衷于探索旅游的本质，分析游客的旅游体验，是研究旅游符号内涵和文化意义的核心人物；后者对旅游给目的地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更感

① 赵红梅：《旅游人类学理论概谈》，《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光映炯：《旅游人类学再认识——兼论旅游人类学理论研究现状》，《思想战线》2002年第6期。

兴趣，是旅游的影响研究的重要支持者之一。^①

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年中，中国人类学学者大多忙于人类学的重建，几乎没有关注旅游领域。^②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情况来看，黄惠焜 1995 年发表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的论文：《调整视角——让文化人类学积极介入云南旅游资源的开发》是国内最早以人类学的视角研究旅游的学术论文。之后，章建刚翻译美国学者 L. 辛厄的论文《“原始赝品”、“旅游艺术”和真实性的观念》，1995 年发表在《世界哲学》第 S1 期上，文章主要讨论了少数民族工艺品与旅游真实性的问题。2000 年，张晓萍在《思想战线》第 1 期上发表了《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一文，译介了国外旅游人类学的先驱纳尔逊·格雷本的理论观点，是中国大陆第一篇以“旅游人类学”为题的学术论文。

1999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在昆明召开的“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旅游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会后出版的由杨慧、陈志明、张展鸿主编的论文集《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是中国大陆第一本以旅游人类学为主题的论文集，也是开启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先河之作，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

宗晓莲于 2001 年发表在《民族研究》第 3 期的《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以及同年发表在《思想战线》第 6 期的《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译介了国外当时最新的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新气象。2002 年，张晓萍等人翻译出版了瓦伦·史密斯的《东道主与游客》，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界更加全面地了解国外旅游人类学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04 年，宗晓莲翻译出版了纳什的《旅游人类学》，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热潮。同年，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集编译、介

① 宗晓莲：《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思想战线》2001 年第 6 期。

② 孙九霞：《旅游人类学在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